

知识生产文丛

问史哪得清如许

傅國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知识生产文丛

问史哪得清如许

傅国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问史哪得清如许 / 傅国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知识生产文丛)

ISBN 978-7-5399-9102-3

I. ①问… II. ①傅…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7231 号

书 名 问史哪得清如许

著 者 傅国涌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02-3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3

1912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在历史的上空，这个问号若隐若现，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26

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在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纸上的县治理想

56

他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文明，他们是古老中国一小部分先文明起来的人。如果用成败标准去衡量，他们追求的理想迄今还停留在纸上。但当时他们确实真诚追求这一理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70

那些关于各处乡村求生的记录，一不小心就成了1934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同黑白的默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但历史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命运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的轨迹，影响着相斫相杀的历史方向。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87

他给雷震的信中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第二辑

时局 饭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103

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说一代精英的公共生活格局。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128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1933年，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却要写诗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故乡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爱他、护他的人。但是，已经改变不了鲁迅不喜欢杭州的事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39

鲁迅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锐，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他内心多么渴望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变得更健全一些。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150

中国历史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就是破坏力,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力量。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另一种力量不指向政治,它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的,并不是雷霆霹雳,跟那些农民暴动有巨大的差异。

“九〇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160

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178

低调理想主义强调的并不是一个人要有多么耀眼、多么显赫,而是脚踏实地,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耕耘。在我们栖身的这个时代,似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各个角落从事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但是这些不起眼的事情,放在整个历史当中,恰恰可能是最长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191

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钱穆说荣氏的人生观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荣氏身上他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一面。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203

文化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文化的作用是长远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个张謇能为故乡带来什么乃是不可

估量的。我看到了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影响历史的进程。
有了张謇，南通就有了灵魂。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215

码头上彻夜映照着灯光，工人的号子声、汽笛声、起重机的声音、江水拍岸的声音……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融会成了一曲最最动人的交响曲，七十年后，我来到宜昌，在长江边上，试图寻找当年的痕迹，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227

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盗亦有道”，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都值得思考。

到成都寻找历史

237

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重视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的不朽。或者借助先贤的光环，来凸现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这个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为杜甫而存在的。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249

第一輯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当他应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其人留给他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共和之问，他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

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十三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对此颇有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

……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①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共和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确实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举国上下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么。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帝制的循环中打转，一代代的哲人圣贤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中华民国诞生之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学教科书，为顺应时代的需要，才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共和的课文。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书干脆就叫《共和国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四册即有课文《大总统》，第七册有《共和国》《自由》《平等》等课文，第八册有《国庆日》《选举权》《法律》《司法》《行政》等课文。《共和国》一课简明扼要，将共和的原则说得清清爽爽：

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

虽然，一国之人数至多，欲人人参与闻政事，为事势所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93页。

不能,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

共和国以总统组织政府,以议员组织国会,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限制,故无专擅之弊。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第八册也有《选举》《博爱》《平等》《自由》《好国民》等相关课文。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国体与政体》《民国成立始末》《共和政体》等课文,第二册有《人民之权利义务》,第三册有《国家》《国民》,第四册有《地方自治》《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临时约法》,第六册有《政党》等课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爱来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二册有《自由》,第四册有《博爱》,第六册有《人权》等课文。何谓人权? 课文如此回答: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

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与民国同步诞生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用于新时代的教科书，抢了商务印书馆的先机，得到了部分教科书市场。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孩子们也可以读到《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国民之自治》《共和国民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

仅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每年的发行数都在七百几十万以上。^①正是透过这些教科书，共和观念悄悄地渗透到千千万万少年的心中，与报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话语，及标榜民主、共和的政党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浪潮。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渍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邹容鼓动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出现了“共和国”这个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个“共和”。而辛亥革命造就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共和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之得

^①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①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他的倾向共和并非一时感动。袁世凯之接受共和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么?民国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领袖张謇,为大势所趋转向共和之际,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共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共和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②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人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

①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80页。

② 张謇:《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08页。

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对政府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政府过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觉得，过问政治是一条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险道路。”^①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做，也不愿做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共和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②商务印书馆被迫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共和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被废止了，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共和记号的课文、日子，都与袁世凯格格不入。

① [澳]乔·厄·莫理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281页。

②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二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排场来迎接他。袁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